

◀ (上接4版)

哈特穆特·莱平:只有一些泛泛的评论。地中海世界的人们甚至都不能区分印度和中国。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东方。

不过,对于源自波斯的聂斯托利派的叙利亚语史料作者,我们也了解得不多。我们了解的多是罗马帝国的。有一位6世纪的聂斯托利派的史料作者科 斯 马 斯 (全 名 Cosmas Indicopleustes,指“去过印度的科斯马斯”),是个商人。他对东方有更准确的看法,但他不相信地球是个圆形,他认为是平的。科斯马斯有些与众不同,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僧侣,当然他还是十分虔诚的。

古代有许许多多的史料作者,个个在智力上充满挑战、极富趣味,像修昔底德、柏拉图等——但我们要知道,这幅知识图景也是片面的。阅读柏拉图固然愉快得多,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文本来源,我们也会喜欢一些更接地气的写作者,例如商人。这方面,叙利亚语文献里很少,因为主要是僧侣和神父在写作。

我们三人都变成古典史方面的教授,与阅读利巴尼乌斯有关

文汇报:您的研究领域是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,您怎么定义这个时段?法国学者雅克·勒高夫(Jacques Le Goff)有一本书,名叫“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”,他有一个新的概念“长中世纪”——非常长,从5—18世纪。您对历史分期有什么看法?

哈特穆特·莱平: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来看,我是从一位古典历史学家起步的,主要研究罗马史、罗马铭文,还有修昔底德。但我很早就对古代晚期感兴趣,因为这一时段(特别是基督教与异教之间)知性概念的交换非常之多,这点非常吸引我。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是,新的信仰如何处理与过往文化的关系。曾有一个讨论,古代晚期到底是不是古代的一部分。以前的《剑桥中世纪史》是从君

士坦丁大帝写起的,但现在不是了。

德国的许多古典学家倾向于说,当基督徒变得主导时,就不再是古代了。但如果你从政治架构的角度看,西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5世纪。东罗马帝国则持续到了15世纪。

在我看来,分期始终和你所处理的问题视角有关。你可以说,有一个一直持续到8世纪的长长的古代晚期,我们普林斯顿的同仁彼得·布朗(Peter Brown)就是这么坚持的。他认为欧洲真正的变化要到查理大帝,公元800年时,他是第一个被教皇加冕的北方皇帝。这一组合在罗马帝国时代是边缘化的,教皇还是个新鲜事物。但如果你看得更细一些,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,法国南部都一直使用罗马法,而法国北部用不一样的法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延续性。

如果你再看看智性发展,对我来说,最具决定性的不同是7—8世纪由阿拉伯人的扩张带来的。但是仍然,在这些区域内部,还是有不同。我一直感兴趣的是,哈里发王朝重新将

古典艺术介绍到西班牙。西班牙早前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,也被古典艺术所塑造;之后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,不愿或无法维系古典艺术;阿拉伯人到来时,则重新带来了古典艺术的形式、立柱,他们也阅读古典文本。因此,事情是很复杂的。必须有分期,才能让海量材料变得有条理,但是古代历史里又从来没有一个天定或任何人给定的分期。问题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分期。

对叙利亚来说,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分期就不成立。前阿拉伯时代和后阿拉伯时代,才是改变整个叙利亚社群的处境的分野。

我们历史学家对这种具体到年的划分,也是非常当心的。不过话说回来,我认为古代晚期应该持续到公元530年代,但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可能就会给出另一个年份。而将来的人如果回看我们这个时代,他们可能会觉得1989或2001年是最重要的时间。所以我认为,在历史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给人们多重的视角。要认识到,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社会实体,对历史有不同的观看视角。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、“真实”的、线性发展的历史。

文汇报:古代晚期是很晚才跃起为独立的研究时段的,是吗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是从19世纪开始的。最早是德语里出现“古代晚期”(Spätantike)一词,这个词想要表述某种衰落,spät是晚的、走下坡的、破败的意思。如果画像里的脸变丑了,人们就会用spät。因此“古代晚期”一开始是个贬义词。到20世纪早期,出现了变化。艺术史学家阿洛伊斯·李格尔(Alois Riegl)强调说,了解每一个时代对于何为艺术的想法都是重要的。他引入了Kunstwollen这一概念,这是个非常德国的词,很难准确翻译。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对什么是美的想法。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同样也为了尊重其他的传统。

文汇报:您是如何开始对这一时段感兴趣的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有一个我个人经历里的关键时刻——是在马尔堡大学的一门课程,老师是马尔科姆·埃林顿(Malcolm Errington)。这门课有三个学生,我们的阅读材料是一位4世纪的叙利亚异教作家利巴尼乌斯(Libanius),当时,他所生活的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基督教化。利巴尼乌斯是一位古典传统下的教师,他写下他

自己所经历的变化。最后,甚至连看一眼神庙都不被允许了,因为基督教禁止人们显示出哪怕一丝异教崇拜的迹象。我们看到他如何绝望地捍卫自己所受的教育,捍卫他所热爱的传统。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文本,也是非常难读的希腊文。我想最后我们三个人都变成古典历史方面的教授不是偶然,就是与阅读利巴尼乌斯有关。

另一个因素是生活在一个可能威胁你核心价值观的世界的经历,这种感觉在1980年代尤其深刻。那时候我们倾向于将古代晚期沿着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线索来解释,两边都感觉另一种文化在威胁他们,但是现在,则是宗教在现代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,结果这一想法同样也影响了我们对古代晚期的研究。这是2001年事件的结果,也是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落幕的结果。

现在,我们在德国就在讨论。例如,在我太太的学校,就有关于穆斯林女生是否应该上游泳课的讨论,是不是应该被看到身穿泳衣。这个案子最后到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,他们说可以,学校有权利强制女生这么做,她们可以穿“布基尼”(burkini),一种遮盖身上绝大部分的泳衣。

家长们还提出一点:女生们不应该看到那些半裸的男人。然而,法庭裁决说,在我们的社会,看到这样的是正常的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辩论的许多议题之一。其他讨论还有关于哪些场合允许戴面纱,如果穆斯林教师们不准戴面纱,那么教师中的修女可以戴十字架吗?这是一个很艰难但是引人入胜的讨论过程。

在古代晚期,我们会看到这些新的区分是怎样产生的。有一种社会理论叫“系统理论”,是一种很复杂的方法,但简言之,如尼可拉斯·卢曼(Niklas Luhmann)所说,社会不是被人们定义的,而是被他们认为重要,或赋予重要性的分别和差异所定义的。

在公元1世纪,对于基督徒来说,他们必须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肉。因为古代文化里大部分的肉都来自献祭,祭司会卖掉这些牺牲来赚钱,这是他们获利的一个重要途径。问题是,那时候基督徒是否被允许吃那些来自异教献祭活动的肉。

不过,你可以抱着中立的态度来讨论古代吃什么肉,但在今天的社会讨论同一问题的时候,一定会有情感上的代入,很难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,

叙利亚的本土语言

罗马帝国境内存在多种语言传统,其语言流通和传承的情况大体包括如下四类:其一,通行于精英阶层、逐渐成为官方书面语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;其二,利考尼亚语(Lycaonian)、凯尔特语(Celtic)等行省平民使用的本土方言(多以口头形式流传);其三,希伯来语、埃及语等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方言(公元135/136年的巴尔·科赫巴起义[Bar Kokhba war]遭镇压后,希伯来语文学一度中断);最后是由基督教传播而产生的地方语言兴起趋势(vernacularisation),其中尤以科普特语(Coptic)和叙利亚语(Syriac)为代表。

谢尔顿·波洛克(Sheldon Pollock)在其印度梵语研究中指出,地方语言的复兴存在“literalisation”(日常用语的规范化运用)和“literarisation”(诗歌等形式的文学创作)两种路径。以脱胎于埃及圣书体

(hieroglyphs)的科普特语为例,其在吸收了希腊语字母表的基础上得以简化,不仅是人们日常习用的语言,也是文学及宗教经典的传播载体。因此,科普特语的兴起见证了“literalisation”和“literarisation”的推动作用。

叙利亚语文学的发展

叙利亚语源自阿拉美文(Aramic)的埃德萨方言,有时用楔形文字(cuneiforms)形式写成。在两河流域兴起的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等东方帝国皆以阿拉美文作为官方行政语言。亚历山大东征、希腊语在东方传播后,阿拉美文仍是当地的通用语(lingua franca),并且是奥斯若埃尼王国(kingdom of Osroene)的官方语言。根据叙利亚基督徒的说法,耶稣本人曾授命奥斯若埃尼国王阿布加五世(Abgar V)保护当地基督信众。因此,叙利亚人自视拥有和上帝的直接联系。公元2世纪,叙利亚人巴尔德沙

尼斯(Bardesanes)以对话体写成第一部叙利亚语著作《诸国律法书》(Book of the Laws of the Countries),奠定了叙利亚语文学的基础。另一方面,发现于瓦迪·埃·纳特鲁恩的大量古代叙利亚修道院抄本系古典文献的译文和评注,如哲人波尔菲利乌斯(Porphyrus)的作品。其中还有叙利亚语文献,如富有斯多葛哲学色彩的“赛尔拉皮翁之子马拉(Mara bar-Serapion)的书信”,以及米南德(Menander)戏剧的译本,这些都有明显的异教古典传统痕迹。

公元2—3世纪,被称为“通行本”(Peshitta)的叙利亚语新、旧约圣经译成,塔提安(Tatian)写成《四福音书合参》(Diatesseron),叙利亚语文学逐渐兴起,并于4世纪臻于繁荣。随着萨珊波斯(Sassanides)的崛起,叙利亚再度成为罗马与东方帝国的角力场,而由于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国教(萨珊波斯则大肆屠杀基督徒),厄弗莱姆(Ephrem)等诗人极力宣扬亲罗马政策。

(摘自哈特穆特·莱平“古代叙利亚基督徒的身份认同”讲座,翻译:吴桐)